一

革 命 之 初

童年的记忆

1914年5月，我诞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上。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我的生母是菲律宾人。我父亲在福建时，家中有房二间，地五分。第一次结婚几个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买卖。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他的第二位妻子就是我的母亲。这在当时是华侨中常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当地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

在菲律宾，我父亲和我生母各开一个小店，独立经营。父亲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

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我一家兄弟姊妹九个。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养的；二哥叶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二个妹妹。

1919 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鞍乡。

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就被土匪“绑票”了，好不容易赎回来，就匆忙离乡出国，以后就再不敢回来。从此，我们兄弟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留在故乡苦撑家业。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的缘故吧。她没有生育过，我和二哥回到家乡，她就把我们当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

我幼年还乡后不久，就被送去读书，先上了半年私塾，念的是《三字经》。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上课什么也听不懂，只见先生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不觉嘻嘻笑起来，这下可闯了祸，先生拿起竹板戒尺打我手心……小孩子学说话很容易，

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家乡话，还学会读写一些汉字。第二年，进了乡里的完全小学。

我读书的当年，这个小学有的教师比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使我从小就受民主、革命、正义、平等、真诚、无畏、牺牲……这些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读高小的时候。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是国民党左派，很喜欢我们弟兄俩。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每次考试的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被我俩轮流占去，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经常给我们讲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走向革命之路

1925 年我高小毕业，叶老师建议我们兄弟俩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里有的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我们的功课底子好，考取了厦门中山中学插班生，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

我上英文课很轻松，因为过去学过，读《模范英语读本》第二册就基本没有什么生词。其他的功课也不大费力。我在课外有时间就看课外书，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和进步书刊。小学时喜欢看《三国演义》、

《水浒传》，中学时受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影响较深，鲁迅的作品也看，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不大懂。那时我们也经常传看一些革命的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向导》是我最喜欢看的刊物，也看《共产党宣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读物，但当时还看不懂，比较易懂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大革命时期，这些书刊在厦门是可以公开出售的。

大革命时期，厦门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是当时共产党的据点，教师、学生中都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罗明，闽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郭滴人等，都在集美学校读过书。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福建的反革命政变也是“四一二”那天，首先从厦门开始，这几个学校就是重点。我们中山中学的高中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厦门学生会的主席，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国民党在厦门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我们厦门中山中学也被强行封闭。学校被封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学到厦门的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是厦门惟一的省立中学，就是现在厦门一中的前身。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走革命的路。那时我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由于我年纪太小，还不到

入团的年龄，算是外围的成员吧，跟着团员们一起出去散发传单，贴标语……

到了 1928 年下半年，福州、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那时我虚岁 15，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当时厦门的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C·Y”（即共青团的简称),并交给我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很快我就介绍了我二哥启存和有关同学入团，并建立了支部，选举我任支部书记。

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刚入团，浑身是劲，东奔西走，充满热情。这年冬天，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打算。那时十三中是四年制我已读完，再加一年预科，就可以考大学。叶贵煌告诉我：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个人素质，组织上打算培养我，但这就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放弃升学，完全转人地下。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满腔革命热忱，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便回答说：只要是组织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二哥，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不要文凭了，并且给家乡和国外的父母去信说：中学毕业了，和朋友到日本留学，由朋友负担学费，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这当然都是假的，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

不久，我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下工作者，主要是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的活动方法，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概是因为我在处理家庭和个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所以把我送到这个训练班培养。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在惟一的一次“脱产”学习。

从事工人运动

1928 年底，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担任厦门团区委书记。主要从事工人运动。

厦门开发早，当时也算得上是福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海员和码头工人，还有两个罐头厂。当时，党在码头工人中的工作较有基础，其次是海员。罐头厂工作基础较差，我便到罐头厂去做工人工作。

我是学生出身，第一次和工人们一起生活，虽然住在工人宿舍里，但和工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隔了一层，这时还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建立了团支部。

1929 年春，中共厦门市委改组为福建省委，团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厦门团市委改组为团省委，厦门建立团区委，实际就是团市委，我担任团区委书

记。到下半年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团省委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长。

1929 年冬，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我作为福建省的青工代表前去参加。这时我第一次到中央参加全国性的会议。

记得会场是在慕尔鸣路（现名茂名路）的一所公寓里，大约三十多个代表挤在一个屋里开会。代表们分散居住，当年我刚 16 岁，是最年轻的两个代表之一。

这时期党已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开会，感到这才有革命气息。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当时党的政治局委员，全总的党团书记，也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我们这些青工代表对这位我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十分崇敬，他的英勇的斗争经历大家都是熟知的。我非常认真地听了项英同志在会上的报告，至今还印象深刻。项英同志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当前的斗争策略，他特别强调了青年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工会中应当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可以组织青年小组。”会议讨论了青工工作，认为党的“六大”决议中关于“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

1930 年，我到团省委工作，上半年我到晋江、

福州巡视工作，有幸见到了著名的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景仰恽代英同志，喜欢读他的文章，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同他交谈，感到非常荣幸。当时，他代表中央在福州巡视工作，找我谈话。我知道他学问渊博，又是中央领导，但见到他的外表却十分朴实，平易近人。他教导我：团的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团的干部要群众化，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谈话中，他循循善诱，非常亲切，真所谓“如沐春雨，如坐春风”。这是我第一次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领导，确实是革命青年的楷模。

入　　狱

1930 年 7 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次被捕和当年哄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四十余名共产党人，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同志等。1930 年 5 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具体行动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干脆利落。等

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7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做“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个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但也不愿轻易放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由于当时刚发生过劫狱事件，我

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放死囚牢监禁。

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二十年以上徒刑的重犯。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痨病，备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来探视，送东西。

我看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二哥回国后和组织联系上了。他来探监，使我们终于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我的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送来的东西所包的报纸，都有一些重要消息。

1931 年底，我刑满出狱，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

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也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福州救亡潮

我出狱之后，因为在厦门已经“红”了，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在团省委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左右，便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也随我去福州任团中心市委的组织部长。

我调到福州工作时，党的中心市委书记是蔡协民同志。蔡协民同志找我谈话时问我办了转党手续没有？我当时还不大明白，认为团委书记都是同级党委的委员，还办什么转党手续呢？蔡协民同志告诉我，立三路线结束后，恢复党、团、工、群，规定没有办过转党手续的团员都要重新履行转党手续，这样，蔡协民同志就作为我 转党的介绍人。不入 ,蔡 协 民 同 志调回厦门，他的工作由陶铸同志继任。

福州团的工作是有基础的。到我接任团中心市委书记的时候，在连江、福清和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地区均已建立了团组 织，福州五六个中学中，茶叶工人、人 力 车、造 纸等待 业以及闽江的搬运工人中都有团支部。我到福州 工作 后，整顿了人力车工人的支部，又发展了锯木、印刷等几个支部，记得人力车支

部就有一个同志参加了市委的领导。

当时在福州，团的工作最有基础的是在学校学生中，福州省立一高就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学校贫寒学生较多，后来出现了不少干部，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入团的。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是福州一中的学生。当时有个特点，进步学生一般都是高材生，因为他们读书多，思想活跃，知识面广，又关心时事，容易接受革命影响，所以后来许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的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城区各学校广泛建立了宣传队，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召开抗日救国大会。1932 年春，福州几个学校在西湖开化联合举行爱国宣传大会，并演出抗日戏剧。这时，驻福州的日本领事和日本军舰“北上”号的舰长无理撕毁会场的抗日标语，并掏出了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公愤，打伤了日舰长。各校学生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外，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当时提出的一些宣传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脱离群众的，这是由于受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影响。

我在福州工作不到一年，1932 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

二

鏖战　闽东

闽 东 星 火

闽东地处海隅,文化落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的影响不大。1926 年前后，闽东一些在北京和上海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党组织，在闽东地区开展党的活动。1929 年冬，闽东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1931 年 2 月，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同志主持，在福州召开福安工作会议，决定改组福安县委，把县委机关移到农村，改变过去局限在知识分子中活动的状态。1932 年 5 月，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定，强调福安党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会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亲自来福安组织武装斗争。“兰田暴动”取得胜利后，福安正式成立了闽

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以后，除霞浦、周宁县外，其他各县都建立了红色游击队。

1932年下半年我到宁德霍童时，那里已有三十多人七条长短枪的工农自卫队，由区委书记颜阿兰率领。

1933年5月28日，正是端阳节，我和颜阿兰率领文湖、半岑村的工农自卫队五十多人，从小石半岑出发，一举拿下了霍童民团驻地宏街宫，缴获二十六枝枪，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记载的“霍童暴动”。接着又乘胜出击，接连收缴了坑仔里、赤溪地区共八十多枝枪，遂于六月底建立起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

游击队建立的早期，常常混进流氓无产者。闽东地区民心强悍，又多山地港湾，在残暴的封建压迫下，多有铤而走险上山下海当所谓“土匪”的。当革命初起时，这一批人参加进来，确是“很能勇敢奋斗”，而且会使用武器，懂得军事，在暴动中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也确有“破坏性”，流寇思想较严重，破坏纪律，发洋财，甚至抢劫也会发生。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造成严重危害。

对于这一问题，闽东党组织较早引起了注意。为了纯洁内部，保证游击队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我们统一思想，采取了果断措施。第一，坚决清除“土

匪”分子，其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动员一批党员和纯洁的贫雇农参加，成为游击队的基本力量；抽调一批区委干部担任班长、队长和政治指导员。第二，游击队建立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第三，普遍进行“游击队是干什么”的教育，明确游击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明确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划清游击队进行土地革命与“劫富济贫”的界线，肃清流寇思想，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觉悟。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对“土匪”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保证了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各项艰苦任务。

生 死 之 间

闽东福安县有一个叫狮子头的地方，离县城约有六十多里，是个渡口，由赛歧到福安一定要在这里过渡。这个渡口有家客店叫狮子头客店，是一座孤零的上下两层的木头房子。这个客店实际上是我们闽东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1933 年冬季的一天，我从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下来，中午到了客店等着和一个同志在这里接头。我先在楼下坐一坐，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店主人就把我带到楼上吃饭。这时，我听到楼梯响，有人上楼，我以为是来接

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望，不对，上来了三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那三个人从楼梯口几步跑过来，我还来不及掏枪，他们就将我按住，朝我开枪，我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鲜血淋漓。他们开完枪，搜去我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就跑开了。我脑子还清醒，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了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正看着我死没死。那人一看我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 还没死！”并跑过来朝我又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手臂上。我竟还没死！紧接着，我听到楼下哨子声响，有人急促地叫道“快走，快走！”我听到楼上那人跑下的声音，楼下的人纷纷跑出去的嘈杂声，但我还是没有动。

又过了好久，周围悄无人声，我才抬起头朝四周探望，确实没有人啦。我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不由想到这次非死不可了。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躺在那里，脑子里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想到我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想到自己死得早了点，年纪还轻，才 19 岁，不能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了。又躺了一会儿，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非死不可，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一下子求生的欲望变得很强烈，要